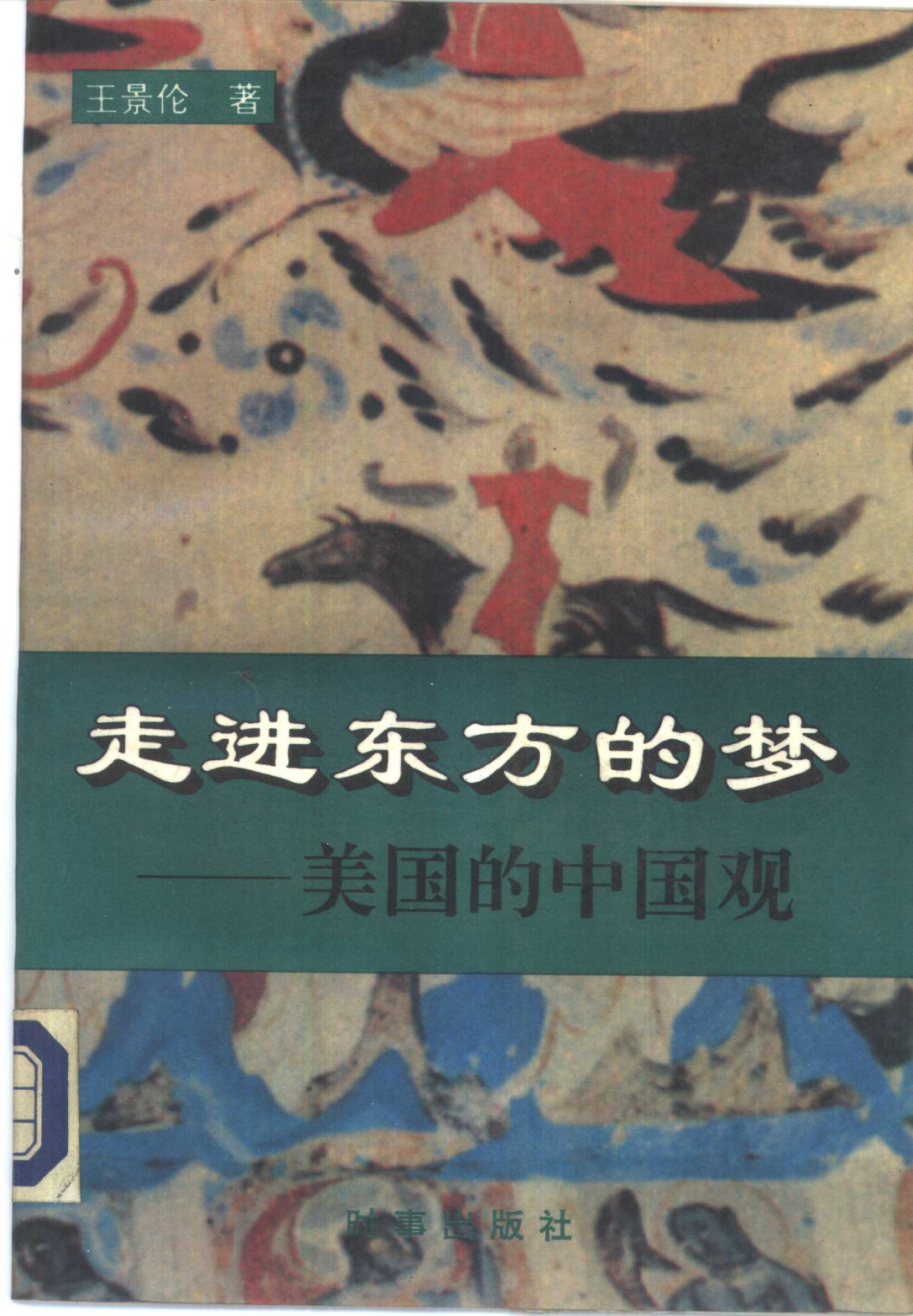




王景伦 著

走进东方的梦

——美国的中国观



时事出版社

走进东方的梦

——美国的中國观

王景伦 著

时事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3 号

走进东方的梦
——美国的
中国观
王景伦 著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 2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45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7-80009-222-4/D·104 定价: 13.80 元

作者自序

汉学(Sinology)亦称中国学(China Study),作为外国研究中国的一门学问,最初是在英国发展兴起的,二战后,在美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国遂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中心。从80年代开始,大量的汉学名著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并受到广泛的重视。

改造社会,最重要的一点是认识社会。因此,对于西方的汉学,我们应该采取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的态度,进行深入地研究,作为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工具。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认识自己都有很多的局限性,中国也是如此。

首先,我们人人都有一种心理——往往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往往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这种心理或来自对积极事物的向往和期望,或来自对消极事物的恐惧和抵制。总之,这种心理使事物的本来面目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当我们受到现实的自身利益的束缚时,事物的本来面目会更加远离我们。

其次,如果我们长久生活在一种环境中,就会对它感到麻木,就会对许多事物习以为常,从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忘却了它们对我们生活的意义;不论它们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而一个外来人则会对它感到新奇,去研究、思考它们,从而去发觉我们身在其中却感受不到的东西。

最后,是我们在方法论上的异同。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他们与西方同行的距离,要远远大于自然科学工作者与西方同行的距离,而这一距离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当西方的汉学家们走出“中国特殊论”局限,而用多学科“区域方法”对中国从事全面、立体的研究的时候,中国学者们往往还在深受思想的、方法的教条之苦,这样,许多具体的事物及其具体方面就被忽略了。

另一方面,不言而喻,汉学家们也有汉学家们的局限。

毕竟，他们是外国人，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为山外人，庐山的面目也并不是向他们敞开的，他们不得不面临着团团云雾，而要解除这种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谈何容易。正如李希腾斯坦(Peter M. Lichtenstein)在总结中国问题研究时所说：理解中国就像是剥洋葱。每当你剥掉一层，又发现了另一层。每当你认为你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有所理解时，不久你就会发现，还有更多的东西有待理解。恐怕我们永远也达不到这颗洋葱的核心。但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研究趣味盎然。

主观因素的包袱对他们也同样是沉重的。作为一个普通工作者，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个人的处境，都会使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产生偏差，而一旦把中国与西方社会长期隔绝的状态以及东西方价值体系的巨大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些因素再加进来，所研究的结论就更加远离现实了，甚至在某一点上捕风捉影，妄加猜疑。作者在触及这一问题时，尽可能既指出其弊端(或给予批评)又能反映美国的中国学的原貌，两者结合的好坏，还请读者明晰。

作者自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最初导致他写作此书的，主要是对这一领域的兴趣和不知深浅的那股蛮劲儿。当他真正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仅仅是那汗牛充栋的资料就曾几度使他退却，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后来，他从一位汉学家的话中获得了信心，这位汉学家说：“我们还需要一些不负责任的劲头。为什么不呢？每一代人都学会了他们要扮演的最后角色，无非是让下一代人进门前用脚踩踏一下的垫子；这是值得、也是应尽的一种义务。”那我还顾虑什么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杨希雨先生、阎学通博士、陶坚博士、钱春元先生、宿景祥先生、方华女士等人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方华女士撰写了本书第六章的一部分。特此表示感谢。

1993年10月15日

导 言

18 世纪末,美国有关中国的全部知识就是:中国就是那个为 1773 年波士顿茶会提供茶叶的国家。不久,它又从别的国家那里听到了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这些最初的印象受到启蒙运动热情的影响,使美国把中国看作一个有着理想化的政府和充满人情味的社会。总之,在当时美国人的头脑中,中国的形象是抽象的、神秘的和不现实的。

1830 年 2 月 22 日,美国首批商船“罗马号”到达澳门,25 日抵广州,从而拉开了美中直接接触的序幕。在“罗马号”船上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是个传教士,名叫毕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他开创了中国研究,这样,传教士便最早成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其背景刚好是美国国内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急速衰败的时期。这样,美国想像中的中国和它实际接触到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过去有关中国的幻想开始破灭,直接为一种极度贫困的形象所取代。

1849 年,传教印刷商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iams)出版了《中央王国——中华帝国和中国人:对中华帝国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和宗教等的研究》一书。书中提出了一个论点:中国人不仅需要标志西方文明的技术,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教义。早期中国学家的这种特殊身份及其观念对美国的对华态度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仍未摆脱它的传教士角色,所取得的进展也未超越《中央王国》中所表现的价值观和基本态度,一直企图把社会科学和以人权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的教义强加中国。因此,美国对待中国人民的态度一直充满着高度连续性的、强烈的文化价值观。

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开始把中国——一个非西方文明的国度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启蒙运动所描绘的理想化的中国和 19 世纪所接触到的落后的中国作了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从这种分析中获得了一种全面认识中国的方法。然而,顽固的、旧的习惯随时都可能影响美国采用正确的态度,近代史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总是在幻想和幻灭中左右摇摆。与此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主要兴趣仍遵照欧洲研究汉学的传统,即主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这种古典的中国学十分注重原始资料,所采取的方法是:熟悉语言——翻译史料——进行史料学分析——进行历史编纂学的分析——概括——总结;自发地摸索现象之间的联系,把事件串连在编年的杆轴上。这些工作吸引了学者们的大量注意力和精力,并产生出“中国例外论”: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产生以来,中国历史展现了许多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很特殊的东西,诸如卜骨、丝绸文化、官僚政府的早期实践、科举制度、绅士阶级,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家的长期延续和关于其统治的绵延不绝的记录。

中国学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它是随着对中国的“区域研究”的发展而产生的。“区域性”(Regional)一词是哈佛大学的叫法,它是与某一特定地区连在一起使用的特定称呼。这个词的意思是同时使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段对世界的各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专门研究。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行为科学,以至文学和更细的学科——所有这些学科都开始产生训练有素的专家,用以研究某个特定的地区或国家。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美国与中国》是以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的一本经典专著。它是一部概括性的评述著作,内容紧凑,高度浓缩。它就中国问题所作的多学科的分析,部分地是依据费正清所记录的其他学科的权威学者们对中国区域性研究发表的

见解。他曾请国际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 (Facult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的三位成员卡尔·弗里德里奇 (Carl Friedrich)、爱德华·梅森 (Edward S. Mason) 和塔尔考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用一些选择得当的词句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分别概括出来,然后在他们各自的演讲中用更为简明的方式把这些原理运用于说明中国的具体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问题的研究内容也不再是以汉学传统为主,而是以当代问题研究为主,同时开始推动语文教学的工作。这样,经过了几代人之后,美国人终于在过去的基础上产生了现在的认识中国的方式,他们既从它的历史又从它的现实状况,既从它特有的传统又从社会科学的方法出发来认识中国。中国问题研究能力的不断增长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由于社会科学对有关原则的明确界定和视界的世界化,中国历史完全成为可比较的东西。因此,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性也就随之消失。诸如在社会结构、家庭系统、宗教崇拜、统治机构、对外贸易、对外国人的畏惧、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中国例外论”,便由于把中国研究作为整体中的个例来研究而逐渐削弱。自然,这就产生了新的景象和更广阔的前景。

对中国的基本看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提出了一个同早期汉学家那种强烈的文化价值观完全不同的论点,费正清 1946 年 2 月 11 日在对美国新闻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宗旨提出意见时指出:中国要现代化,而不是美国化。凡是我们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事物,不一定也对中国有益。中国问题的解决途径大致可概括如下:将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应用于广大群众的生活。后来他又指出:“共产主义”在美国是邪恶的,而在中国却是有益的,中国和美国是有着不同“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国家。遗憾的是,这种看法在当时和以

后,都没有对美国公众和政府产生多大影响。总的来说,美国对中国依然保持着早期传教士的面孔,向中国布美国的“道”。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由此而产生的关于“共产主义危险”的担忧,激发起美国付出巨大力量来了解中国这个新的敌人。1949年以后展开的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被当作一项有关美国国家政策的活动。美国政府对此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它采取的影响最大的措施是对中国大陆出版物的大量翻译,主要是报纸和杂志的翻译,并将这些翻译分发给对当代中国问题有兴趣的学者,给学术界以极大的帮助。联邦政府还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开始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研究予以支援。在学术界,专家们指出,美国应该用理解的态度,而不是用战争或歇斯底里的态度对待中国革命。哈佛大学和其他研究中心教育和研究工作的进展也日益明显地表明,美国逐步创建了一个国家所需要的学术团体和教师队伍。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学术研究领域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学术界的研究活动主要是由一些私人基金会和大学来进行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是支持美国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三个主要基金会。从1959年到1968年这10年时间里,美国私人基金会以及联邦政府用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经费超过3300万美元,其中还不包括美国各政府机构本身及与其他机构合作的研究费用。这些大量的和空前的财政上的支持,是中国问题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有关的组织活动也迅速展开,1959年,福特基金会召开一次由大批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联合组成。它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各大学研究中心之间就1949年以来的中国研究进行合作。其会员从社会科学研

究理事会及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董事会中对近代及当代中国有兴趣的大学教授中选出,主要从事以下几方面的活动:(1)对获得博士学位的个人所从事的研究予以补助;(2)调查和研究会议的召开;(3)资料的汇集;(4)学术的交流。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提供行政上的协助。联合委员会以后又设立了一些基层的学科小组委员会,以便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展开对中国的研究。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许多大学,也纷纷建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二战爆发时,在美国设有中国或亚洲研究机构的大学大概不超过十所,但到了五、六十年代就增至数十所,现在全美有关研究中国的机构有二、三百个。在政府方面,许多有关国家安全和外交的部门,都有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配合政府政策的需要。

1973年11月8-9日由美国学术团体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发起的关于优先考虑中国研究规划的会议上提出,要把中国学“作为全国性事业”,建议“必须建立一个能为中国学研究服务的全国性图书馆”。

在“区域研究”方法的指导下,美国专家们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社会学家最注重的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及控制的变化,思想改造的技巧与程序、社会变迁、家庭和家族制度的变化的关系等。关于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的研究是较近的时间开展的。美国法学家主要研究中国民事与刑事的司法行政组织,中国司法制度的背景和发展以及中国对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观点。如同社会学家一样,美国法学家也在中国文件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方法上花费许多时间。

心理学家则研究中国社会控制的特殊方法,如“洗脑”、“劳动改造”等。教育学家对教育被用来作为思想灌输的工具颇为重视,同时他们也对中国教育制度以及与教育有关的人才问题发生兴趣。研究文学史与社会科学的学者对研究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冲突

进行专题研究,例如,“百花运动”及其影响便受到极大的注意。在科学方面,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为数极少,有一些数学家、医生就其自身工作范围曾从事个别的研究,但没有有组织的及大规模的研究计划。

经济方面,学者曾致力于中国经济定量与非定量的研究,如国民收入、工业增长率及其发展形态、非农业人员就业情况、农业政策和对外贸易等有关论文。此外还有专题研究,如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建筑业、工业布局、运输系统、动力资源等。此外,政府预算、动力刺激、企业管理、“大跃进运动”等,也都成为研究的主题。

政治方面,政治学家们从早期对中国政权结构的普遍的叙述性的探讨,发展到对政治体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过程、领导权问题、政治文化的特性、各种政治组织的功能、政策制定程序、动员方法、军事在政治上的地位、通信系统、政治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以及许多关于中国政治领导、政治参与、对外关系、政治思想(尤其是影响行为的)、显要人物和比较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研究。

这些研究的进展既取决于中国的发展,也取决于可获得的信息的连续性。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为进行研究工作,美国的专家们学会了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来源:中国的报刊书籍;移居外国的中国人和在华西方人士的叙述;对移居国外和出国的中国公民的采访;小说;外国政府的分析;在中国进行个人观察和现场研究中得出的信息。他们在这方面所花费的精力足以令中国的同行们感到惭愧。

50年代前半期,在专家们眼中,中国报刊铁板一块的性质,再加上没有重大清洗活动,使得中国问题专家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中国领导层团结协作得很好,决策也是通过集体过程的。中苏同盟更促使分析家去强调中国新政权的苏联式性质:领导人对马列主义坚决奉行;政府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极权控制;中央计划经济,资源悉由政府分配。

中国的这一形象还自然地引起若干关键性的论题,其中包括: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是否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中国共产主义的学说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控制与动员机制是怎样运转的,特别是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国家与社会之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共产党通过什么机制把原来已经解体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中苏论战和中国脱离苏联的控制促进了中苏共产主义的比较研究。

百花运动、反右斗争,以及受其影响而出走香港的知识分子,又点燃了学者们对知识界的兴趣。

其他重要的思想潮流对中国研究领域提供了启发。特别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员,他们因对马列主义有所了解而集中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及哲学思潮的研究上。其中最突出的是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Schwartz)和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等人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探索。这些和其他史学家的著作以新中国的第一个15年为视角,探讨一些根本的思想方面的问题,即中国领导人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使中国现代化,同时又保持中国特色。

1966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在这期间获得的新材料对分析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红卫兵小报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材料提供了过去不为人知的、50年代中期以后的高层政策,一些重要的文件也被披露出来,如庐山会议的重要材料,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材料,毛泽东的讲话、文章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等等。

这些材料和现实均说明,中国是个充满冲突的社会,并为专家们提出了如下急待探讨的题目:什么东西导致这个体系分崩离析?冲突过程留下了什么后果?冲突的来源是什么?红卫兵是怎样组织起来并相互火并的?各个具体组织的结局如何?

除描述这种冲突外,这一概念还激起了对中国的权力分配和

决策过程的研究分析；到 70 年代中期，就中央决策过程的性质曾经有过一场生动活泼的大辩论。由于这些争论，中国问题专家还发展了许多研究中国社会的模式。对中国社会差别的巨大性质保持敏感和对极权型的观点不再迷恋，又向人们提出另外的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是什么？社会阶层划分的模式是怎样的？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如何与政治体制相互作用？各阶层采用什么战略来对政策施加影响？

从 60 年代中期起，毛泽东思想也成为中国学家感兴趣的中心课题，“美国开始了对毛主义的疯狂崇拜”。

在毛以后的时期里，改革与未来的发展便自然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主要论题。与此同时，大量新获得的材料也对过去许多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分析提供了基础。

专家们对当代中国的看法仍然是五花八门、左右摇摆的。

在 50 年代，专家们统一的观点是，中国的革命是很成功的。后来，鸣放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问题专家的情绪，他们分裂了。有些人仍然抱着早期的希望，也有些人持怀疑态度，有的为“成功”吹号，有的提出批评。而且各种观点的影响也在不同的时期内此起彼伏。例如，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新“左派”把中国看作某种新的乌托邦，或者像一些学者所歌颂的原始森林世界，或者像从未接触过“文明”的大洋洲各民族的过原始生活的“浪漫主义”之类的东西。他们还异口同声地说，文化大革命保证了中国今后的顺利发展，并被说成是“群众路线”对官僚主义作斗争的胜利。当时，美国的整个学术界都受这种影响的感染。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整个美国知识界又充满了一种新悲观主义倾向。很多人说，文革是坏的，所以整个中国都不好。他们现在似乎在等下一个危机。看破红尘的学者相信变化总是会来的。他们在等待中国的下一个灾难和危机出现。至于这场灾难会是另一个政治运动或是社会革命还只能猜测，但内心总觉得这方面的可

能性太大了。

但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例如，鲍大可 (Dosk A. Barnett) 在他的《不确知的航道》中评估了毛以后中国问题的广度。作者抛弃了中国政治的“冲突样板”论，设想在长时间将出现理性统治的局面，并下结论：在毛以后的时代里，经济、国家安全以及社会政策将无可避免地出现变革。邹谠 (Tsou Tang) 在他一系列犀利清晰的论文中，把极权型和历史视角结合起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极度政治化，并指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不符合五四运动以来的主导思潮的。他还进一步断定，在中国激烈的派系斗争中，胜利者将清洗败北的对手，他们有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长期趋势，突然把政策转到相反方面。研究共产主义革命比较学的理查德·洛文撒尔较早论断说，以乌托邦幻想为基础动员组织起来的政权不能长久继续下去，不可避免地让位给更加讲求实用的官僚统治。施拉姆对文化大革命的前景也做了合理的推测。艾克斯坦 (Alexander Eckstein) 教授则认为，对外贸易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分析家充分利用资料，但不让自己的研究进程受资料 and 事态所左右，从历史和比较研究的角度去观察事物。

概括来说，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主要还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两国间的长期隔离。从 1950—1970 年这段期间，美国送到月球上的人，要比送到中国的人还要多。直到 1979 年以前，大多数学者不能在中国作研究工作，必须依靠替代性的、不完整的材料来源去研究中国社会；各种材料来源时断时续，达到极不正常的程度。在利用流亡国外人士的叙述时，专家们还受到叙述者观察力、准确性、理解力以及对这些材料的概括力的影响。即使在毛以后的时期，要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实地调查仍不在开放之列，外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不可能应用他们专业的研究技术：在一个生活社区持久的居留；用闭卷开放式的问题问答表对他们研究的对象进行抽样调查。即使在有机会进行观察

与采访的地方,研究者也受到政府权力的压力。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解释,要是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人民经历过的这些磨难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众对政府的态度,那就没有抓住中国现代演变中的主要方面。然而,80年代以前,人们对此所知不多,没有去深入探索中国事态的发展,也没有把它反映在他们的分析中。

而且,在专家们看来,中国新闻工作缺乏独立、批评、负责的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也缺乏不偏不倚的传统。因此,想有效地利用中国出版物,极其困难。美国的学者发展了许多技术,以严密的方法去“破译”中国报刊里的“密码”。例如,研究上层政治的人要审慎地盯住那些高层领导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露面、消失、在照片上的排列顺序,领导人常常提到的口号的变化,以及领导人的职务变换。西方是从这众多的线索中找出它的解释的:1955—1956年关于农业集体化的辩论;1956—1957年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争论;对“大跃进”领导层中发生的裂痕。

这就构成30年来主要方法论上的困难问题。这种种因素再加上中国的发展,使当代中国研究成为一个起伏不定、变化莫测的领域。

其次是受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如果国内的精神良好,社会稳定,美国的专家们也就容易一致。例如,5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就被中国的良好气氛所感染,普遍一致地得出了比较积极的结论,而当中国发生分裂时,学者当中也随之产生分歧。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中国舆论的影响,例如,当中国一致宣扬“文化大革命”时,许多学者也跟着赞扬;当中国批判“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也跟着谴责。

美国国内的形势也是影响学者观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学家们被当作“巫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成为禁区。与此同时,由于无知的禁忌,

连“中国通”也不能过多地谈论中国问题。又如,在六、七十年代,美国为一系列国内问题而忧虑不安:越南战争、种族主义、官僚主义、城市腐败、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通货膨胀和失业、穷人医疗条件不良、吸毒,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率上升,面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美国人失去了自信,越来越想从国外的思想和解决办法中取得借鉴,中国成了一个特别激励人心的国家。因为,中国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基本上消除了内争、极度通货膨胀、周期性的饥荒、文盲及迷信等似乎无法克服的一系列问题。专家们还认为,中国在某些与美国直接有关的领域内进行着大胆的实验,如:教育、城市规划、刑法学、公共卫生、工厂管理以及军民关系。中国革命在国家和社会的本质问题上,向广泛承认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对于人类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提出了一个乐观的启示。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持一种赞同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当时世界环境下的一个人类共同的梦。

最后一个影响因素是学者们运用的具体分析方法。在 50 年代,当许多学者们从极权的观点出发对中国的稳定作出乐观的论断时,对宗教、农业社会、家庭结构感兴趣的人类学家提出另一视角,以国家和社会相互作用这种传统模式作为出发点。他们警告不要高估国家改造社会的能量,因为社会有能量来改造吸收国家机器的基层结构,或对它提出有效挑战。最后,有一些分析家使用现代化的理论,发出警告,指出从 1949 年到 60 年代中期,中国进行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并不是只是中国的独特现象,其他地方的现代化过程也曾引起上层内部冲突,以及群众间的严重社会紧张。在“文革”前夕,这些分析家曾警告说,不应该把中国的持续稳定视为理所当然。总之,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现代化理论家们多从本专业的理论出发确定研究项目,而不是看重从可以得到的材料出发。在美国的中国学中,相对来说,他们的著作更能经受时间的考

验,比那些基本上按资料来源确定的研究计划的著述更有长远价值。